

十四十三晨昭公卒定
氏體於公室陽西執
凡子不世退而終時
樂華子獨衆
通屏志臣 歸象成荒
道不可行 陳冠以威
乃修詩書 正樂定雅
治哉治哉 待價而起



文化溯源： 东方与西方的学习理念

李瑾（美） / 著 张孝耘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溯源： 东方与西方的学习理念

李瑾（美）/著 张孝耘/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溯源：东方与西方的学习理念 / 李瑾著.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ISBN 978 - 7 - 5675 - 2794 - 2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东西文化—比较文化—
研究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6923 号

文化溯源：东方与西方的学习理念

著 者 李 瑾
译 者 张孝耘
项目编辑 宋坚之
审读编辑 朱妙津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21
字 数 35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2794 - 2 / G · 7753
定 价 52.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Learning: East and West (ISBN - 13: 978 - 0521160629)

© Jin Li 2012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2015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3-155号



随着大家期待的《文化溯源：东方与西方的学习理念》一书的出版，李瑾为东西方（儒家及欧美/苏格拉底式文化）数百年来人类与教育发展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由此也确立了她当代杰出学者的地位。她的研究方法包括对表现东西方传统的相关文献的深入探讨、对受两种不同文化熏陶的父母与孩子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以及她从自己（作为社会成员及母亲，且兼有两种文化教育背景）的角度所作的观察。

这样的学术论著是我前所未见的。这是把横跨数世纪的与文化传统相关的经典、对各种教育学习实证研究的文献，以及作者个人所作的广泛的研究与精辟分析的结论交织于一体的成果。书中，李瑾对于诸如言谈与保持静默的不同功能、两种文化传统崇尚何人何事的若干差异对照，及教育过程中美德的作用等方面的探讨，揭示并分析了很多迄今尚不为人理解的行为表现。她还具体阐明了当个人面临两种不同文化碰撞时会发生的状况，以及未来仍将会不断出现的各种情形。我向来非常佩服李瑾分析研究与综合论述的天分，但没有想到会形成如此兼容并蓄、叹为观止之作，实在令我折服。毋庸置疑，这是一部引领这个重要领域未来研究的扛鼎之作。

——摘自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 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暨教育学霍布斯教授(Hobbs Professor)为本书参加“美国教育研究学会杰出著作奖”评选所撰写的推荐信

此书谨献给我已故的父亲李多胜、母亲
卢荣智,他们竟能在那狂乱的世界中培育出
我学而不厌之心。

不同文化传统中学习信念 为何存在差异？（代序）

陈向明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

初识本书作者李瑾博士是在 1988 年秋季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系列迎新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艘游船上偶遇，当时她正身怀六甲，身边有一位白人丈夫陪伴。此后 20 多年，虽然我们相隔重洋，每次我去美国或者她来中国，我们都会设法相见，共叙友情和学术心得。当有人问及我们相识多久了，我通常会打趣说，看看她儿子的年龄就知道了。后来，她的母亲到美国帮忙料理家务，我又不时从她那里听到有关她与母亲和丈夫因文化不同而产生的种种误解，感觉既有趣又发人深省。

例如，当她非常客气地对自己的母亲说“妈妈，请您为我开一下门，好吗？”时，她的母亲会十分不悦，斥责她说：“我是你妈，又不是外人！你对妈妈干吗这么客气？”而当她口气很直接对自己的丈夫说：“Micheal, open the window!”时，她丈夫会说：“你说话为什么这么不客气，为什么不说‘请’（would you please）呢？”由于中国人秉持内外有别的做事原则，对于关系比较亲密的自己人，说话时不必过于客气；而西方的个体主义强调个人边界，求人（哪怕是自己人）做事时需要客套语言的修饰和润滑。

我们都知道，研究者的学术旨趣和现实关怀通常是与其个人生活经历和感悟密切相关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每天发生在她自己生活中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思想上的触媒），导致李瑾博士对文化问题非常敏感，进而在过去 20 多年中一直从事文化比较的研究工作。她对欧裔美国

人与华人对学习文化信念所进行的研究,其中不仅包含了她自己在美国学习和成长的亲身经历,而且渗透了她在跨文化家庭环境中育儿的独特体验。在本书《文化溯源:东方与西方的学习理念》中,我们可以不时地看到她自己与儿子的交往以及她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相关例子。这些内容让作为读者的我们感到,这不仅仅是一本具有理论高度的学术专著,而且也是作者个人心路历程的分享。

学习是人类普世皆然的能力与活动,然而东西方文化对学习却持有一些不同的理念。虽然这些理念很多可能是缄默的、具身性的(embodied),难以被语言所明言,但它们持续地影响着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教导儿童、自我发展的规范和方式。东西方的人们到底持有怎样不尽相同的学习理念呢?李瑾博士通过耙梳数十年的研究文献,特别是基于自己数项长期的实证研究结果,归纳出一种重要的理论分野,即西方的学习模式偏重“心智取向”,而东方的学习模式偏重“美德取向”。前者更加强调学习的知识所得,视学习主要为心智的发展,目的在于探索和理解外在世界;而后者更加强调学习的道德向度,视学习为自我道德与社会和谐的日臻完善,其目的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何两者的差异会如此之大?李瑾博士追溯了两大文化思想传统的历史渊源,并由诸多层面切入(包括学习历程、情绪反应、同学互动、知识表述以及父母引导等),对这两大传统进行了精辟、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根据本书作者的观点,尽管当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导致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加速,然而这两种学习模式并没有相互交融或彼此削弱,反而更加彰显其基本价值。这个结论似乎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左。那为什么会如此呢?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一个文化传统发生了变化?一种文化传统的保持、发展、消融或转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其运作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虽然本书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但指出,如果我们能够静思这些不同学习模式的特点及其对学习所产生的持续影响,东西方的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都应该能够从中得到理论启发和实践思路。

阅读此书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之旅,本书不仅在内容上吸引我,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对我也具有启发意义。作为一名质性研究的推崇者,我发现本书介绍的实证研究方法很有新意。文化信念是一种非常难研究的现象,因为它深

藏在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中,仅仅通过观察和访谈是难以了解到的。李瑾博士及其团队使用了各种别开生面的研究手段和工具,诱发被研究者的内隐信念。例如,要被研究者听到“学习”这个词语时写下自己联想到的词语,然后对词语进行排序和归类分析;让被研究者看图说话,回答问题,或完成故事叙述的后半段;对母子对话进行实录,然后对其进行话语分析;将研究结果用各种图表展示出来,使其具有直观对比效果,等等。该研究团队不仅在美国对欧裔美国人和华人进行了比较分析,而且在台湾和四川等地对华人家庭进行了追踪调查,因而使研究结果具有更多地域上的推广度。

正如任何研究结果都可能引发读者不同的反应一样,我对本书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也有一点个人疑惑,在此提出来与作者和其他读者商榷,以求进一步探究。首先,将东方(中华)学习模式定义为“美德取向”,将西方(欧美)学习模式定义为“心智取向”,是否足够准确和周全?根据柏拉图的名著《普罗塔戈拉》,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提出做人的五种美德:正义、智慧、节制、勇敢、虔敬。虽然对少数人和多数人的要求有所不同(少数将成为哲学王的人需要具有上述五种美德,而大多数被统治者只需要正义、勇敢和虔敬),但学习就是帮助人努力获得这些美德。也许,随着西方社会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兴起,现在的西方人对心智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如果是这样,我们则需要同时考虑不同文化传统下人们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而不仅仅是文化传统中存在的差异。

此外,本书所列举的华人社群经常使用的词语,如“认真”、“勤奋”、“刻苦”、“专心”等,在我看来似乎更多地表达的是一种“学习态度”;而欧裔美国人所使用的词语,如“批判性思考”、“自我表达与交流”、“探索世界”等,所表达的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学习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华人更加重视学习者在态度上是否勤奋努力,而欧裔美国人则更加看重学习者的能力。如果这样来解释,将分析的抽象层次从“美德”和“心智”的高度降到“态度”和“能力”(或“心智能力”)的层次,也许会更具包容性?西方人“能力取向”的学习模式可以兼具“美德”的属性,而东方人“态度取向”的学习模式也可以具有“心智”发展的维度。“美德”和“心智”就从相互对立的关系,变成了兼容并包的关系。而在如此重构的理论视角下,两个文化传统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会更有可能,也才有可能从一个方面回答如下问题:不同文化中学习信念的融合和转化何以可能?

在提出上述困惑后,我通过邮件将自己的思考与李瑾博士进行了交流,下

面是她在收到我的邮件后几个小时内便作出的回应。在此与读者分享她与我的对话,目的是希望激发读者更多深入、广泛且缜密的思考和探索。作为本领域的外行,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和直觉在向她提问;而她作为本领域的专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认真、系统地回应这个问题,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她作为一名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和能力。为了有便于读者阅读,我在保证内容意义不变的基础上,对她的回应作了一点文字上的修饰,并为所有英文词语标注了中文翻译。

你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你的道理。从这个角度一直都有人在提类似问题,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倪育菁教授就跟我提过,西方学者的独立性是不受政治、金钱左右的,那也应该是一种美德。顺理,西方批判性思维也是一种美德。最近在加州有关人类美德发展的研讨会上,也有人提出类似的看法。我对此无相左的回应。

根据 Linda Zagzebski 1996 年有关 human virtues (人的美德)的专著, virtue(美德)的概念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两本专著。此后,不断有西方人对此进行探讨。Zagzebski 说,传统的定义是 virtue(美德)兼具 moral(道德)与 cognition(认知)两个层面。Zagzebski 还指出, virtue(美德)具有另外两个定义: (1) 是一个人做事的 excellence(优秀); (2) 是一个人很深的 trait(人格特征)。加起来,就是一个人长期做某事时,将这件事做到最好时的样子,即做事的方式。那么你指出的“态度”由此看来与 virtue(美德)是有关联的,因为态度在西方与东方都含有 moral(道德)与 cognition(认知)以及个人决定与付出的意涵。我的书里对 virtue(美德)的定义与解释也基于这条思路,尽管当时写作时还没有读到 Zagzebski 的书。

尽管西方对 virtue(美德)并不陌生,而柏拉图等其他哲人早就在讨论 virtue(美德)的议题,但是整个西方哲学以及后来的社会科学更多讨论的是 moral(道德)的问题。这主要是基督教独统天下的原因,而古希腊的 virtue(美德)基本被基督教的教义所取代了。相比之下,儒家文化不太谈一些“超大的道德问题”,如摩西十诫似的杀人、偷盗、婚外遇、作假证等,相反更多谈的是日常的修身,如何对待家人和他人,如何做人,等等。所

以我读到的不少西方学者对儒家的看法是以 virtue(美德)为主导的概念。

至于西方强调“能力”，我也同意你的看法，尤其是自西方有了 test intelligence(检测智力)的传统之后。我没有选用“能力”这个概念，主要原因是西方哲学在人的 mind(心智)与 mental functions(思维功能)上着墨远多于 ability(能力)。比如，西方神学不太谈 ability(能力)，但是大谈 divine mind(神圣心智)，因为 mind(心智)含有能动性 with intention(意图)/purpose(目的)，也是 ability(能力)的来源、储备所及操控所。但在本书里，ability(能力)的确是 mind(心智)的一个重要表现。

读完上面李瑾博士的回应，我把我们之间的对话发给一些中国同行分享。大家都对文化与学习这个课题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非常有必要讨论文化对学习模式及儿童学习信念的影响，也有必要讨论文化转换的可能性与非可能性。^① 此外，每位同行都对文中的观点、内容、文字等提出了修改建议。我相信，如果我继续与其他同行交流，将引发更多同时也更加深入的探讨。这也说明，李瑾博士研究的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学习信念为什么存在差异？这些不同的信念是否有可能相互融合和转化？什么情况有可能，什么情况下没有可能？是否有必要相互融合和转化？”……这些问题，我想，只要有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一定会继续保持其神秘不宣的魅力，也一定会引发更多的、像李瑾博士这样的研究者继续为之倾心付出。

① 在此，特别感谢如下学友对我的提点：王富伟、高一虹、郝彩虹、杨朝晖、向蓓莉、胡艳、程方生、贺爱江等。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李瑾博士，她的回应激发了我们学术团体的进一步思考。

自序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唐代诗人贾岛(779—843)用这两句诗表达了一个人在长年努力之后能有所成的心愿，而本书的完成，我投入的准备工作更远超十年光阴，虽然结果不全然合乎期望，但是我并不在意慢慢地磨这把剑。随着书页的开展，读者或能体会到这漫漫的淬炼过程所给予我的莫大喜悦和意义。

创作本书的念头始自1990年代后期笔者博士论文将完成之际，原定的书名中有“好手心”(a heart and mind for wanting to learn)一词，这个中国人固有的学习概念是我论文的研究主题，最早来自家母的建议。我一向会与母亲分享我的所学所闻，所以在寻找论文题目之初，首先便询问母亲对西方心理学中“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一词有何联想。这个西方的学习概念让她十分迷惑，思索良久都无法从中文里找到任何相关的词汇，最后她才咕哝着说道：“学习需要什么动机啊？我只听说过‘杀人动机’(motive to murder)。”(英文的 motivation 和 motive 译成中文都是“动机”，两者的差别突然让我也弄不清了！)但我明白如果连受过大学教育，而且陪着我好像间接读了博士班的母亲都无法理解“成就动机”为何，那么我未来在中国的研究对象多半也不会理解。于是我问她如何用中文表示一个人的学习欲望，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好手心”，我一听感觉像中了头彩一般，对啊！母亲真是一语中的，我怎么没想到呢！之后我请教了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中国同学，欣然发现他们都一致认同这个说法，但是我们绞尽脑汁也找不到一个妥帖的英文词汇，于是决定仍旧翻译成“a heart and mind for wanting to learn”，虽然有点拗口，但是却能最准

确地表达“好学心”的意思与感觉,而且最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后来我的研究和写作即以此中国固有的概念来代表中国人的学习模式。

我毫不怀疑这个中国人的学习模式反映了他们与生俱来的观念、态度、热情和治学方法,因为我也有着同样的成长背景。但是当我将之与后续选出来代表西方的欧裔美籍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精英的学习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却让我很意外。两种文化同样重视学习,有着类似的悠久的历史传承,拥有同样丰富的学习相关概念,同样实行幼教、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而且更重要的是教学内容也相似(除了数学、科学以外,中文地区也有英文课程)。然而,两者具备的和学习有关的概念却大不相同,鲜有重叠。我没想到会出现如此出乎意料的结果,进而不禁好奇这样显著的文化差异,如何能逃过以往学者的法眼。我必须承认此时的我接受西方教育已超过15年,但直到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东西文化差异有多大。我之后对儿童观念发展的研究也证实了文化强大的形塑力量。我推想如果以我这样兼具中西学习经验与自觉的人,都无法完全掌握到文化学习模式的深邃内涵,其他人恐怕更难。因此大家或许也很高兴有机会能够超越目前学术期刊及学术界专业领域的范围来认识这些差异,这一体会也更坚定了我创作本书的决心。我希望能将过往分散在不同主题之下的研究汇整起来解答两个基本的问题:(1)形塑出不同学习者类型的两种文化学习模式为何?(2)二者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

本书企图呈现的是描述及诠释,而非规范性的论述,因为我的目的是藉由回溯双方各自的知识传统、指出文化学习模式如何影响儿童的观念,及其在学习过程中如何表现三方面来铺陈中西的基本文化模式。希望藉由描述文化学习模式及儿童的学习观念,彰显出文化模式是怎样如同无孔不入的光渗透进入人对儿童的教育方法以及儿童的发展之中的。然而不同文化的渗透方式不同,其响应也不同,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让它自然地发出光芒,然后记录其影响。

多年前我还在读德国文学系时,一位从事德国戏剧评论的中国专家曾惋惜地表示,中国人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伟大的艺术,但是却无能将其转化为理论。他之所以会提出这样具有挑衅性的主张,是因为得知德国名剧作家贝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在莫斯科观赏了中国京剧演员梅兰芳的表演后就领悟而发展出了疏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理论。布莱希特可以从京剧抽象但平常的表演技巧中“发现”其独特的戏剧效果,让这位中

国的文学评论家感叹中国人有能力而且应该建立自己的艺术理论,但却要仰赖西方人的帮忙来“提升”自己艺术形式的价值。同样地,学术界的做法和布莱希特其实如出一辙,也就是从理论的层次来解释活生生的文化经验。虽然理论性的观点无法取代心灵深处的思想和情感,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更多自身文化中光是靠生活经验(但缺乏反思)无法触及之处。我希望本书能够激发读者在文化理论的光芒下看到并思考学习和人类发展的议题。

我要再次说明,本书着重在讨论东西方文化中一般性的学习态度倾向,而非个体的差异,亦无意将文化倾向概推到该文化中的个体身上。即使是声称以具文化代表性的样本为对象所作的实证研究,其概推性(*generalizability*)仍然有限。没有一个重视文化因素的社会科学家会企图用全面概推性的理论来解释所有的个体,我以及其他人的研究都无法避免这一本质上的局限。但尽管如此,学者一般都同意如果同样的现象长时间经由许多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后都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那么该结论应该确实是成立的。本书亦无意讨论与基本文化倾向不一致或者反其道而行的部分——事实上这部分比比皆是——有些人的个别状况不符合或不适用于本书描述的文化现象,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了解,但这不是本书的重点。我关心的是一般的文化倾向,而不是文化中非典型或者与之冲突的例子,因为我感兴趣的是文化的运作(*workings*),而不是反常或者失败的特例。

最后,漫长的写作过程让我得以自由、广泛且深入地思索书中的各个主题。我也因为这缓慢的磨剑之路而有机会从一个只会全盘吸收、囫圇吞枣的学生变得善于观察、质疑,并且发现自己文化的优点,一改以往不断批评的态度。此一智识上态度的转变不但有助于我向西方的大师们学习,也帮助我重新向自己的文化学习。这种跨文化学习的特点和好处在于它的过程,首先,你要把陌生变熟悉(西方),把熟悉变陌生(中国),然后再将两者吸收融汇,但同时持续将两者作为思考的对象。

我非常感谢威廉·格兰特基金会(William T. Grant Foundation)的赞助,珍妮·班波夏(Janie Bemperchat)及苏珊·何洛维(Susan Holloway)对中国移民家庭中青少年及其他民族的同学研究;儿童发展基金会(Foundation for Child Development, FCD)资助我研究中国移民家庭中的学龄前幼童;蒋经国

基金会资助我和冯涵棣博士的合作计划；史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支持我早期对学龄前幼童学习观的研究,以及接续最早由 FCD 资助而目前仍在进行的纵向研究计划。本书中若有任何疑似不当的言论或者疏忽之处都属我个人的责任,与上述资助机构无关。

我很幸运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能得到多位研究助理的帮助,非常感激。我也要谢谢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参与本研究计划的数以千计的小朋友、大学生和家庭。由于他们的应允,我才有机会一窥文化学习模式的内里和他们个人的学习观。也由于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想法、感情、家庭教育,以及他们父母所分享的养育经验,我才能揭开这数千年来传承的面纱。读着每位父母的访谈、每个孩子的故事、每个大学生对学习的描述,我体会到作为一个研究者所受的福泽,回思这段日以继夜工作的日子,真是完全值得,毫无遗憾!

我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优秀专业的工作同仁精心制作本书,谢谢剑桥心理学丛书的编辑思敏娜·凯林(Simina Calin)接受我的著作计划并耐着性子让我慢慢写,以及继任的艾米莉·斯班格勒(Emily Spangler)帮我提交文稿。也很感谢剑桥心理学及认知科学丛书的现任编辑爱汀纳·博克(Adina Berk)、编辑助理阿曼达·欧康纳(Amanda O'Connor)、制作监管(production controller)乔舒亚·潘尼(Joshua Penney),以及其他许多幕后工作伙伴的努力,让本书得以付梓。也谢谢印度纽根知识工程(Newgen Knowledge Works)公司的计划经理嘉西·帕布(Jayashree Prabhu)有效统筹所有版本文稿。最后,要感谢纽约 PETT Fox, Inc,他们优异的专业审稿水平毫无疑问使本书更加完善。

抚今追昔,有几位对本书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若是略过不提将令我不安。首先是我的德文老师们,谢谢比格先生和夫人(Herr and Frau Bieg),他们打开了我的视野,引领我进入德国语言及文化之堂奥。还要感谢对中国文化极有兴趣的伊丽莎白·库兹(Elizabeth Kurz)、教导我德国文学和西洋艺术史的乌苏拉·慕勒(Ursula Müller),以及若内塔·比纳科察(Reneta Bürner-Kotza)和苏珊·君特勒(Susanne Günthner)对我进一步修习德文的鼓励与支持。

我要感谢匹兹堡大学的唐诺德·慕沙克(Donald Mushalko)和巴巴拉·

菲德特(Barbara Fredette)两位教授对我在培养儿童创造力方面的启发并支持我申请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继续深造。我很幸运能受教于我的恩师寇特·费修(Kurt Fischer),他鼓励我研究人的自我意识性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尤其是羞耻感及其在各文化间的重要变化。这一学术上的探索帮助我完成了本书中有关学习情绪(learning affect)一章的大部分内容。

另一位恩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他对我的帮助是我此生报答不尽的。他虽然知道我的英语能力恐怕不足以完成所修的课业,但仍冒险接受我进入博士班就读,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大学主修德文而非英文。在此谈及这段宝贵的师生之缘是为了强调欧美籍的博士班指导教授要花费极大的功夫来引导求知若渴但迷惑的外国学生,并把他们的热情转化成研究成果。为了教导我这样一个文化和成长环境与其他人迥异的学生,霍华德用了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方式,限于篇幅无法尽述,我只能说,他一向而且永远都是我心目中西方学者的典范,他的著作启发了我的思想,他的教学不论在课堂内外都打开了我的视野。他对我尽心的指导已超出了他的职责,是极少有人能做到的。他对于学术研究和对这个世界的洞见,以及他对生命的睿智,始终令我赞叹,也是我最珍惜的宝藏。我很确定若非当初很幸运地遇到霍华德,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也要向挚友冯涵棣表达谢意,她对中国人道德观念中羞耻感的研究不但出色而且令人动容。我很感谢她愿意与我合作研究台湾儿童的学习观及其父母的教导方式。她的研究风格及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展现出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真正深刻的理解,实在无人能及,不论研究对象的话语表情或姿势,没有任何细节能逃过她的观察。她的研究报告真实可靠,不但对于被研究文化中的读者极具说服力,而且文笔细腻深刻。我也因涵棣的影响而决定尝试以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来研究中西两种文化中的母亲们如何和孩子讨论学习这件事。涵棣不但鼓励我,而且慷慨提供给我台湾地区一流学者及作家的资料,我并承蒙相借一位老先生为孙子示范中国人所谓的学习要专心的照片。

我也要在此表达对儿子凯里·汉兹(Kylee Hench)的赞叹,他替我读草稿,提供意见,恪尽人子的孝道,尽心尽力地指出文中生硬别扭的语句及文法错误。他的爱和帮助总是带给我思考和写作上的进步。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先

生麦克·汉兹(Michael Hench),我的终身伴侣,始终孜孜不倦地替我修改文章。他对戏剧的热爱,及信手拈来的西方大师的佳言诗词充盈着我的生活,而且他对亚洲作家和诗人的认识与欣赏经常更在我之上。若没有麦克恒久绵长的爱与支持及他对文学的喜好,我的写作之路想必更加崎岖,遑论完成本书了,我的成就多归功于他。